

木下杢太郎与和辻哲郎的奈良古佛像源流之争

浙江传媒学院 傅玉娟

[摘要] 木下杢太郎(1885-1945)与和辻哲郎(1889-1960)之间的交往历来很少为研究者关注。但事实上在大正年间,两人在考察日本文化的过程中,思想上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奈良古佛像源流之争便是两人这种思想交流的一次剧烈碰撞。虽然这次论争之后,两人依旧各自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论争中所展现的不同观点却反映出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考察日本文化过程中复杂的思想样态与论述模式。

[关键词] 木下杢太郎 和辻哲郎 奈良古佛像

引言

木下杢太郎(1885-1945)本名太田正雄,是日本近代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美术评论家、佛教艺术研究者以及日本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他是一位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涉足文学艺术多个领域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木下杢太郎身上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相较于木下杢太郎,和辻哲郎(1889-1960)可谓是“大名鼎鼎”了。和辻哲郎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哲学家,其所著《古寺巡礼》等已被视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探索思考日本文化的代表作。

从两人的生卒年可以看出,木下杢太郎与和辻哲郎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事实上,他们两人不仅是同时代人,还是东京大学校友,生前交往密切,并且在思想上有过密切的交流。但是两人之间的这段交往历史,一直以来少有人关注,更遑论探讨这种交往对于彼此的思想,乃至对于日本文化史的意义。就笔者眼力所及,目前在中国尚无学者关注到两人的交往,而在日本,杉山二郎在研究木下杢太郎的过程中关注到了木下与和辻之间

的交往,并且也提到了木下杢太郎1920年夏天的朝鲜之行后所写的《朝鲜风物记》引发了两人关于奈良古佛像是否为日本固有的论争。杉山二郎(1974)认为和辻是受到当时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而木下之所以能够逃脱这种影响,做出公平的判断,是因为他具有与和辻不同的特质,本质上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因此能够不拘囿于国家意识。本论点是从个人特质的角度对这场论争的原因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颇中肯綮,但关于这场论争,尚有问题留待解决。本稿中,笔者试图回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探讨这场论争所反映出的问题。因此,本稿将聚焦于木下杢太郎与和辻哲郎在研究古佛像艺术时发生的这场关于奈良古佛像源流的论争,梳理论争的前因后果,分析这场论争反映出的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样态,探寻论争背后深层的历史文化因素。

1 木下杢太郎与和辻哲郎的交往

木下杢太郎与和辻哲郎是东京帝国大学校友。木下杢太郎年长和辻哲郎4岁,于190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而和辻哲郎则于190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一人学

医,一人学哲学,看起来除了校友关系,两人似乎不太可能有太多交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木下柰太郎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但是从小喜欢文艺的他,在课余时间积极投身到了文艺创作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剧本,同时他还是明治末年著名的文艺沙龙“牧羊神会”的创始人之一,而和辻哲郎也是“牧羊神会”的成员之一,两人的最初交往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但是两人的交往真正开始深入,成为思想上的对话者,是大正初年两人不约而同地对日本文化产生兴趣的时候。两人之间思想交流的高峰期则出现在1916-1920年木下柰太郎远赴中国担任“南满医学堂”教授并在中国、朝鲜半岛游历的时期。

从现存的收录于《木下柰太郎全集》中的书信来统计,木下柰太郎一生写给和辻哲郎的书信多达58封,甚至远远超过他写给家人的信件数量。而这58封书信中,有35封写于1916-1920年木下柰太郎的“中国时期”。而在《木下柰太郎宛知友书简集》中所收录的12封和辻哲郎写给木下柰太郎的书信(虽然收录的书信不完全)中,也有4封写于1916-1920年间,并且内容无一例外都是对于古佛像艺术的思考与对话。从这样频繁的书信交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一时期两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是何等密切。

除了上述私信,在中国期间,木下柰太郎还写下了一系列书信体作品,同样采取的是写给和辻哲郎的信件的形式。这些作品包括《故国》(1918)、《徐州-龙门》(1919)、《朝鲜风物记》(1920)等。

从木下柰太郎在中国时期写的致和辻哲郎的私信和公开发表的书信体作品的内容来看,除了与和辻哲郎分享自己的旅途见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与和辻哲郎交流关于佛教艺术的观点。1917年4月5日,结束了首次北京之行的木下柰太郎满怀兴奋地告诉和辻哲郎,自己对佛教艺术产生了兴趣。而几乎同时,和辻哲郎也投身到了对佛教艺术的研究当中。在同年4月10日给木下柰太郎的回信中,和辻这样写道:“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也正对该地域的文化、佛教艺术非常感兴趣。”^[1](笔者译)正因为两人不

约而同地对佛教艺术、东方文化产生了兴趣,两人成为了彼此在考察研究佛教艺术道路上最好的同行者与对话者。

2 木下柰太郎与和辻哲郎的奈良古佛像源流之争

然而在对佛教艺术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两人就奈良古佛像是否为日本固有这一点,产生了严重分歧。我们可以从上述木下柰太郎在中国期间发表的以和辻哲郎为述说对象的文字中看到这种分歧。

1920年8月,在结束了对朝鲜半岛古佛像的考察之旅后,木下柰太郎以致和辻哲郎的书信的形式写下了《朝鲜风物记》一文,并在其中对和辻哲郎在《古寺巡礼》(1919)等作品中提出的奈良古佛像中蕴含着日本文化固有性的观点提出了明确反驳。在此次朝鲜半岛古佛像考察之旅前,在中国生活了近4年的木下柰太郎已经于1917年夏回国省亲之时亲眼观察过奈良法隆寺、中宫寺以及奈良博物馆馆藏的古佛像,也在1918年4月对洛阳龙门石窟进行了考察。可以说,在写《朝鲜风物记》时,木下柰太郎已经对日本古佛像、中国古佛像以及朝鲜古佛像有了比较全面清楚的实地了解,他对和辻哲郎观点的反驳也因此有据有力。

在《朝鲜风物记》中,木下柰太郎通过实地参观考察朝鲜半岛古代艺术遗迹,提出朝鲜半岛的艺术越是年代久远,就越没有“朝鲜味”。他指出:

我进入朝鲜之后,经常是一看到石窟庵的诸佛、各博物馆的观世音,就会感到想要在我国推古、天平等佛像中找出其日本化的努力是无用的。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吧。我认为在时代更近的佛像上或许打上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民性的印记,但是在中国的六朝、朝鲜的三国时代、日本的推古——东方诸邦同时处于文化高潮的时代的作品上,显露的更多的是其文化的普遍性质,国民性等差别还只是一种潜在性吧。李王家博物馆的金铜如意轮

观音与中宫寺的木雕如意轮观音,石窟庵的诸菩萨像与奈良博物馆的阿修罗,谁又能判断出一个完全是朝鲜的,另一个完全是日本的呢。^[2]

(笔者译)

基于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古佛像艺术的实地考察,木下柰太郎认为在“东方诸邦同时处于文化高潮的时代”,即奈良古佛像被创造出来的推古时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佛像艺术中所显露的是三国文化的一致性,并不能从此时的佛像艺术中分辨出各个国家的国民性。也就是说,木下柰太郎并不认为奈良古佛像可以反映出日本的国民性或是日本文化的固有性。

他的这一观点与和辻哲郎在《古寺巡礼》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寺巡礼》是和辻哲郎通过佛教艺术来考察日本文化的力作,和辻在该书中致力于给奈良的古佛教艺术打上“日本固有”的标签。在《古寺巡礼》一书中,和辻哲郎对奈良古寺中古代佛教艺术的方方面面娓娓道来,其中既谈到了建筑、绘画,也谈到了佛像、雕刻。但是在这些娓娓道来的美丽文字背后,和辻哲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奈良古寺的古代佛教艺术中找到日本文化的固有性。

和辻一方面承认日本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源自中国、朝鲜,但是同时他又坚持认为即使奈良的古佛教艺术是从大陆传来的,既然来到了日本,那就必定蕴含了日本固有的特点。因此他将中宫寺观音视为“我们的文化的出发点”^[3](笔者译),认为奈良古佛像身上“存在着唐朝的石佛和印度的铜像上都看不到的某种微妙的特质”(和辻,1919:211)。(笔者译)在该书的论述过程中,和辻运用了他在其后的著作中用来论述国民性的重要工具“风土”,他认为奈良古佛像的创作过程既然是在日本进行的,就必然会受到日本风土的影响而体现出日本的特质。他通过“风土”这一论据想要强调的是,日本文化之所以优秀,其决定性因素来自于日本本身,而不是来自于中国、朝鲜的影响。以此来达到证明奈良古佛像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固有性这一目的。

因此,关于奈良古佛像,木下柰太郎认为其反映的是三国文化在根源上的一致性,创造出这一艺术的是三国处于文化高潮时期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而和辻哲郎则认为其反映的是日本文化的固有性,创造出这一艺术的是日本的特质。两人关于奈良古佛像的源流之争正在于此。

在《朝鲜风物记》中被木下柰太郎反驳之后,和辻哲郎同样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回应。在《朝鲜风物记》发表之时,和辻哲郎的回信就附在了《朝鲜风物记》正文之后。和辻哲郎在回信中解释了自己努力在奈良古佛像上寻找日本特质的原因。他认为“推古的杰作是否是日本人的东西,决定了推古的文化是金刚石还是木炭”(太田,1981:302)(笔者译)。和辻哲郎以奈良的推古古佛像来作为推古文化的代表,而推古古佛像是否是日本人所创造,是否是日本人的东西,则被认为决定了推古文化有无价值。很显然,对于和辻哲郎来说,他关注奈良的推古古佛像,并不是关注佛像所呈现的艺术本身,而是佛像是否是日本人的东西。只有当推古古佛像的创造者是日本人,或者说推古古佛像具有日本的特质,推古古佛像对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才是“金刚石”,否则就是“炭”。这与和辻哲郎关注奈良古佛像的目的有关。正如他在给木下柰太郎的回信中所说,他试图在奈良的推古古佛像身上找到“日本文化的出发点”(太田,1981:302)(笔者译)因此,给奈良古佛像打上“日本的”这一印记是必然的结果。和辻的目的决定了他所看到的奈良古佛像只能是“日本的”。

面对和辻哲郎的回应,木下柰太郎没有再继续做明确的答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认同了和辻的观点。相反,他对于和辻哲郎观点的不认同,依旧可以从他后续的相关文章中看到。在其后发表的依旧是记述他朝鲜之行所见所感的《京城的博物馆》(1921)一文中,他再次提到了奈良中宫寺的如意轮观音和朝鲜昌德宫的如意轮观音,认为两者存在着由于所用材料(一为金铜,一为木质)的不同所带来的细节上的差别,但是紧接着他便强调道:

但是离开这些细节,就其整体印象进行冥想的话,这两者基本上是属于同一高度的作品。到这一步,我就满足了。说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朝鲜的,这需要确切的证据来判断,强行做如此论断的刻意努力中,有太多不纯的心境。

(太田,1981:374)(笔者译)

木下杢太郎的这段话可以视为对于和辻哲郎的回应的再次答复。和辻哲郎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出发点”而人为地给日本古佛像打上“日本的”这一标签的做法,在木下看来无疑是出于一种“不纯的心境”。

木下杢太郎和和辻哲郎关于日本古佛像的源流之争,最终以彼此不能说服对方而结束。从某种角度来说,最初两人关注日本古佛像的目的的不同,就注定了两人对于日本古佛像的关注点的不同。木下杢太郎试图通过佛像艺术,来寻找日本文化的故乡,来印证他在中国期间产生的“印度—希腊—中国—朝鲜—推古—天平”这一日本文化“故乡”的构图。而和辻哲郎关注古佛像,是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出发点”,是为了确立日本文化在亚洲,乃至在整个世界的身份。对于和辻哲郎来说,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朝鲜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他在前述1917年4月10日给木下杢太郎的回信中也曾写道:

……然后我开始变得非常尊敬从推古到天平、藤原的我们的祖先。寻根溯源的话,从印度到中国(特别是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印度文化——唐朝的文化)都必须要细细体味,但是当下我关注的是推古——天平。也去了下奈良(虽然只去一下是不够的)。怀着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心情(一种平生初见的心情),特别膜拜了五六个伟大的雕刻。

(岩波书店编辑部,1984:232)(笔者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和辻哲郎也同样认为,要研究日本古代文化,对日本文化追根溯源的话“从印度到中国(特别是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印度文化——唐朝的文化)都必须要细细体味”。也

就是说,此时他的着眼点还在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尤其是唐朝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影响关系上。但是为日本文化寻找“出发点”的这一目的,使得和辻哲郎在其后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忽视了日本古佛像与朝鲜半岛古佛像之间的共通之处,而是在其中努力寻找其特殊性、固有性,并通过这种特殊性、固有性来力证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在古佛像艺术上,木下杢太郎看到的是东亚文化在根源上的一致性,而和辻哲郎则关注日本文化在东亚文化中的特殊性、优越性。两人考察古佛像艺术的目的,决定了他们所看到的古佛像的不同。

3 木下杢太郎和和辻哲郎论争的背后

古佛像艺术缘何会成为木下杢太郎和和辻哲郎用来探讨日本文化的线索,尽管他们探讨的具体角度并不相同。这一点还需追溯到20世纪初西域的探险热。

20世纪的西域,楼兰古城、莫高窟的经卷被相继发现,引发了西方列强对西域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当时已处于颓势中的佛教艺术的关心。对于古佛教的考古与探险成为了当时列强们竞相展现自己实力的一个角逐点。当时英法俄等国纷纷派遣探险队进入西域,日本也不甘人后。在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三次组织探险队赴西域考察。但是相较于英法俄的探险队,日本探险队在西域的考古已是落后于人了。于是佛教从传入中国之后到再传至日本之前,在中国,在朝鲜半岛留下的古佛教艺术成为了日本人在这一领域可以借以超越西方的契机。地理上的相近、文化上的相通、交通上的便利,都使得日本在这一方面的考察较英法俄列强有更多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20世纪初,相继出现了伊东忠太的云冈石窟调查、关野贞的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调查等。

另一方面,在确立日本文化身份的需求下,佛教艺术成为了实现这一需求的绝佳载体。佛教与日本古代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虽然在明治初期“灭佛毁释”的政策下,当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已经被大

量损毁,佛教已处于颓势当中。但是在“脱亚入欧”高潮过去,重新确立日本文化身份的需求出现时,佛教艺术便成为了用来探讨日本文化、确立日本文化身份的对象。

木下柰太郎和和辻哲郎在关于奈良古佛像的源流之争中体现出来的两种关于奈良古佛像艺术的观点——奈良古佛像反映的是东亚三国文化在根源上的一致性,还是日本文化的固有性,事实在他们的论争之前就已经存在。

从当时关于日本文化的论述来看,当时的研究者普遍承认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研究中国佛像石窟艺术的先驱关野贞在1907年所做的关于平城京的研究中就以一种不得不的语气承认:“平城京的营建,在当时的文化性质上,受唐朝京城制度的影响颇大”。^[4](笔者译)由此可见,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管内心是否情愿,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对和辻哲郎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尽管在《古寺巡礼》中他一再强调奈良古佛像身上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固有性,但事实上,如前所述,他也承认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在根源上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但是,对于关野贞、和辻哲郎等人来说,在考察日本文化的过程中,承认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目的在于重建日本文化的身份。在这一重建的过程中,他们相继发展出了两种论述模式。一种是通过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来证明日本文化相对于亚洲诸国的优越性。即认为日本文化虽然受到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但是日本的优秀的国民性、日本国民固有的创造性,使得受到了影响的古代日本文化也依旧具有日本的固有性,具有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优越性。关野贞在前述比较日本的平城京与中国长安的论文《平城京及大内里考》中就采用了这样的论述模式。他一方面承认日本的平城京模仿了中国长安,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平城京与长安的不同之处,并认为这种不同之处来源于“我国国民创造性的天才”(关野,1907:164)(笔者

译),表明了当时日本“国民文化成熟,其进步已达到充分高度”(关野,1907:178)(笔者译),暗示了日本国民固有的创造性是平城京得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论述模式与和辻哲郎在奈良古佛像上寻找“日本文化的出发点”的做法如出一辙。

另一种论述模式则是视日本文化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继承者与集大成者。前述考察中国石窟艺术的先驱、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采取的就是这种论述模式。1893年,伊东忠太在《法隆寺建筑论》一文中提出“本邦美术近与中国有骨肉关系,远与印度结下深缘,更与西欧经典样式有所关联”^[5](笔者译),认为日本的美术受到了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强调如今除了日本的法隆寺,再难找到那个时代的代表性建筑:

中亚已成荒漠,空余古城断壁,印度的原有样式也已消失,三韩蒙古的样式已埋没于千年历史之中,西欧经典样式正徘徊于消失的边缘。幸运的是,汇聚了此等诸多样式的精华,达到了楣式建筑极致的推古建筑至今仍苍然耸立于我奈良古都边上。吾人称之为法隆寺者,即为此。

(伊东,1893:321)(笔者译)

透过伊东忠太关于法隆寺建筑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法隆寺建筑的诞生汇集了东西方艺术的精华,今天东西方艺术的精华在其他国家均已不可见,法隆寺是唯一的继承者。伊东忠太力图通过对法隆寺建筑的叙述来构建一个“神话”模式:日本文化是东方文化、世界文化的继承者、集大成者。

由此可见,在木下柰太郎和和辻哲郎之前,日本国内对于日本文化的考察已经有了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承认日本文化受到亚洲诸国乃至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者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一者强调日本文化的融合性,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证明日本文化相对于他国的优越性。

和辻哲郎的论述逻辑无疑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而木下柰太郎则止步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朝鲜文化在根源上的一致性,没有再将论述发展向两

种论述模式的任何一种方向。正如木下柰太郎自己在《京都的博物馆》中所述：“到这一步，我就满足了。”（笔者译）他的这种恰如其分的止步，使得他关于中国、朝鲜古佛像与日本古佛像艺术的关系、关于日本文化的探寻得以停留于一个科学、客观的层面，而不至于被当时的时代话语所左右。而和辻哲郎关于日本古佛像的论述，则因他为日本文化寻找出发点的目的所拘囿，走向了对日本文化特殊性、固有性的论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辻哲郎以古佛像艺术为线索关于日本文化的论述是当时重建日本文化身份这一时代要求下的产物。木下柰太郎与和辻哲郎，这对日本文化身份探讨路上的同行者，在通过古佛像艺术追寻日本文化身份的道路上，一方看到的是奈良古佛像与中国、朝鲜半岛古佛像的同源之处，另一方则努力在奈良古佛像身上寻找日本的特质。着眼处的不同，令他们最后关于古佛像艺术身上所承载的日本文化身份的论述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4 结 语

木下柰太郎和和辻哲郎关于奈良古佛像源流的论争，最终以彼此不能说服对方的结果走向了

结束。和辻哲郎依旧坚持着他为日本文化寻找出发点的目的来研究日本古代文化，而木下柰太郎则有意地与这种“不纯的心境”保持了距离。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和辻哲郎的坚持，并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坚持，还是属于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坚持——重建日本的文化身份，是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以东亚诸国为对照，以日本文化的固有性和优越性为追求的论述逻辑，其中隐藏了一种为日后的侵略思想背书的潜在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木下柰太郎选择与当时盛行的这些论述逻辑保持距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他通过古佛像艺术认识到东亚诸国在文化根源上的一致性之后，便选择将认识止步于此。止步于此，并不是因为认识能力不足以进一步深入，而是因为认识到了进一步深入，可能会受制于“不纯的心境”。也因此，他选择认识的止步，是出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自我止步，拒绝为时势所裹挟。同时，他关于东亚诸国在文化根源上的一致性的认识，也为关于日本的文化身份的建立提供了另一种除了固有性和优越性之外的可能性，即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东亚文化的一部分。

注

- [1] 岩波書店編集部編. 木下柰太郎宛知友書簡集 上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4: 232-234.
- [2] 太田正雄. 木下柰太郎全集 第十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1: 283-284.
- [3] 和辻哲郎. 古寺巡礼[M]. 東京: 岩波書店, 1919: 340.
- [4] 関野貞. 平城京及大内裏考[J]. 東京帝国大学紀要工科第3冊, 1907-06: 158.
- [5] 伊東忠太. 法隆寺建築論[J]. 建築雜誌, 1893-11: 320.

参考文献

- 杉山二郎. 木下柰太郎—ユマニテの系譜[M]. 東京平凡社, 1974.
太田正雄. 木下柰太郎全集 第二十三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3.

作者简介: 傅玉娟(1981—) 女 汉族 浙江传媒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hukyokuken@163.com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rigin of the Ancient Buddha Statues in Nara between Kinoshita Mokutarō and Watstuji Tetsurō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inoshita Mokutarō (1885-1945) and Watstuji Tetsurō (1889-1960)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studied by researchers.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they had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when they were researching Japanese culture.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rigin of the ancient Buddha statues in Nara is an example of the collisions of thought that happened between them. The ideas they showed in this controversy reflected the complicated thought patterns and discussion models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en thinking of Japanese cul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continued to insist on their respective thoughts at the end of the controversy.

Keywords: Kinoshita Mokutarō; Watstuji Tetsurō; ancient Buddha statues in Nara

Author's Information:

Fu Yujua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1

Lecturer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hukyokuken@163.com

新版书目

书 名	书 号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非凡.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N5 语法: 归纳整理+全解全练(赠音频)	978-7-5628-5724-2·····	刘文照,海老原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
非凡.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N5 文字词汇 (赠音频)	978-7-5628-5737-2·····	刘文照,海老原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
非凡.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N5 全真模拟试题 (赠音频)	978-7-5628-5862-1·····	刘文照,海老原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
非凡.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N5 听解 (赠音频)	978-7-5628-5893-5·····	刘文照,海老原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
非凡.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N5 读解	978-7-5628-5870-6·····	刘文照,海老原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
漫画图解商务日语:日企入门30讲 (附赠音频)	978-7-5628-4934-6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2
新J.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2019年真题 A-G级(附赠音频)	978-7-5628-6154-6·····	日本语检定协会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4
新J.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全真模拟试题 (A-G级)(附赠音频)	978-7-5628-6131-7·····	朱学松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4
2136 日语汉字多用词典	978-7-2050-9864-3	陈岩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0.4